

处暑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本期看点

暑去秋来，微景燃灯

为什么要谈日本？（之三）

关于“生命”的学问

立异求同的历史写作

孤独者上路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一）

金门的炮弹

目 录

1 / 卷首语：暑去秋来，微景燃灯

5 / 为什么要谈日本？

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讲座实录（之三）

17 / 关于“生命”的学问

——论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

29 / 立异求同的历史写作

38 / 孤独者上路

45 /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一）

58 / 金门的炮弹

| 卷首语 |

暑去秋来微景燃灯



今日处暑。

“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

告别暑气，静待爽秋，又是一季更迭。暑与秋之间，方为处暑。一为过渡，一为转折。

给人生的过渡以暂歇，而由暑渐进凉秋，往往也透露出一丝的无奈和悲色。

山水可以有秋色，人生难得无秋凉。

瞿秋白的人生，虽至秋凉，但真实可触。

被捕之时的瞿秋白，其境也应一如此季般急转，而在他写出《多余的话》之际，更彰显出万般的凉意。“前面已是绝壁，路已尽，灯将灭，他无法再生，可在回望来路时，尽管“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趣的政治上”，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与完美更是相距遥远，可他不觉得可惜，不觉得后悔。”

这是《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一文的引文。瞿秋白真实面对自己的灵魂，多余的话而并非多余，慨叹之余，仍令人赞佩不已。

行事为文，一同此理，不论寒暑如何转换，但求无愧于心，利得天下。正如送人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非常欣赏余世存先生在给《生命的奋进》做的序言中所写的，新儒家是一个时代的燃灯者，“现代人需要摆脱自视时的自以为是，视人时的不以为然，这都是一种生命的无明。现代人需要照见自身的“大宝藏”，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燃灯者，并从他们那里领受生命的光明。”

燃灯者，是一个时代的光明和引路者。也正式《大戴礼记》中借孔子之口所定义的士，“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从此种意义

上来讲，瞿秋白是士，新儒家亦是。

在一个渐凉的节点，发现并珍视身边的每一位燃灯者，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份职责。

落叶飘落泥土，暑气隐遁大地。

人生起伏，境遇斗转，需静心面对，更需静对内心。

处暑之际，是为之记。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6年8月23日



为什么要谈日本？

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讲座实录(之三)

6月14日晚,广东人民出版社联合九州出版社主办的“为什么要谈日本:知日派作家花城论剑”讲座活动在广州联合书店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李长声、姜建强、亦夫、万景路四位“知日派”作家,聊新书、谈日本,与现场观众就感兴趣的相关话题展开交流互动。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自认是“小希腊”

问：在某知名学者的新书中提及：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引入中国并在新文化运动影响大增的“个人自由”观念，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的影响。彼时章太炎、鲁迅、陈独秀等文化学人都是留日出生，国人多以日本为学习西方的中介，新文化运动前期实质上提倡的是“日本式自由主义”，也就是说此间日本成为了中国的老师……那么，今天我们谈日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

姜建强：我们都知道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也有一个说法，“日本就是个小希腊”，特别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自认是“小希腊”，他们希望自己能像希腊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成为亚洲文明的发源地，成为亚洲文化的一个代表。那么在这个原点上，我们中国人到日本去取经，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确实是学到

了一些东西。



[鲁迅（1881年~1936年）在仙台医科学学校留学期间与一起借宿民宅的朋友合影的黑白照片。这张照片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虽然鲁迅在仙台留学时并未留胡子，但房东想象鲁迅10年后的样子，数年后用墨为鲁迅加上了胡子]

日本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战后虽然成了民主国家，但文化的、精神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的。所以尽管你现在看日本的自由度比较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像朝日电视台晚10点新闻播报员古馆，我很喜欢看他的新闻播报，印象也很深。但他在今年3月31日辞职了。他在最后一天直播中坦言，他感觉到最近

几年看不见的政治压力是越来越大,已经无法承受,因此只好辞职。从这件事我感到,没有所谓绝对的自由,都是相对的。

问:我想问下,日本如何看到自己在二战中的失败以及如何看到它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尤其是日本的普通民众如何看到这件事?

姜建强:关于这个问题,从整体上看,日本人对二战尤其是侵华战争这段历史,都是写进课本的。但是写进去并不等于他们对侵华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普通民众是知道二战的这段历史,是侵略的历史。但在日本的政界和学界就比较复杂。他们会把侵略说成“进入”,会把一些东西暧昧化和模糊化。也就是说,日本的政界和学界确实存在比较“右”的势力。

日本人是喜欢猫多一些还是喜欢狗多一些?

问:不知道几位有没有在广州生活过,有没有坐过广州的地铁三号线?觉得广州三号线与日本地铁有什么不同,哪个更人性化?还有一个问题,日本人是喜欢猫多一些还是喜欢狗多一些?

李长声:说到猫和狗,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报道,说日本好像是养狗多一些,我不太确定。我本人是不养猫不养狗的。

姜建强：我补充一点，前段时间我写过一篇关于猫的文章，确实像李老师说的那样，日本人养狗的数量超过猫，但是呢，猫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快要接近狗的数量。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养猫的数量绝对要超过养狗。

亦 夫：你刚刚问到了地铁问题。很抱歉我们都没坐过广州的地铁。日本的地铁在上下班高峰时也是非常非常的挤，要靠人往里推的，有专人往里推，非常难受。

万景路：说到养猫养狗我想起一件事来，我们在日本，常常在公园里看见野猫，但是没见过野狗，（众人笑）把野猫的数量加起来兴许已经超过狗了。

亦 夫：野猫多是因为有闲人定时去投食，一到饭点就有人来喂。

李长声：我建议你们多关心一点民生问题，回答一下关于地铁的问题。（笑）

亦 夫：北京的地铁也很挤啊。我的感受是，日本人在如此拥挤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口角，几乎不会有火气。挤是没办法，必须挤呀。



姜建强：我也没坐过广州三号线，如果把日本地铁和上海的地铁比较，我认为差异在细节上，日本的地铁在细节上更人性化，想到的点面更多一些。

李长声：想到一点，日本地铁专门开辟了女性专列。

万景路：日本男性坐车的时候，一般一手抓扶手、一手拿书或者报纸，只能这样才比较“安全”。（笑）

亦 夫：日语对吃女人豆腐的行为，有两个字叫“痴汉”，就是痴情的汉子。（笑）

问：关于地铁我也想问，曾经在文章中看到，日本地铁里如果有人晕倒，就算那么挤，也会瞬间空出一块空地，这可能吗？是真的吗？

万景路：是真的。我还想到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比如我们在地铁里打电话是很正常的啊，在日本呢，几乎没有人会在电车上、地铁里打电话的，而且都

会把手机调成振动。

姜建强：说到电话，我感觉我们现在地铁里打电话也比较少了，但这并不是出于道德自觉，而是微信出来了，不需要打电话了。（笑）微信没出来之前地铁里打电话的声音还是很大的。

日本的军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



问：我有个疑问，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提及武士道的来源以及为什么武士道之后会慢慢消失。我感兴趣的是这本书说武士道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为什么后来真正的武士道精神会慢慢地消失？

李长声：不好意思，我不太能听明白你的问题，那么我按照我的理解来回答你。日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武士道也可以这么理

解。看日本的文化我们需要看它的演变和重新生成。

日本有个历史时期叫“战国时代”，武士横行，但是战国时代并没有产生武士道。武士道的产生是在江户时代，天下太平了，要改造武士从激情岁月带过来的野蛮的杀伐之气，开始对武士做出很多规定，提高修养，这就是道。

日本的武士道并没有造成它搞侵略，其实是搞侵略利用了武士道。比如说有一本书叫《叶隐闻书》，这本书是江户时代某一个藩主的侍臣写的，当时甚至是禁书，后来发动战争才把它发掘出来，还是岩波书店出版的，要求每个士兵阅读、学习武士道。这实际上是利用武士道来鼓动士兵为国家捐躯。说来武士道并没有多么悠久的历史。

姜建强：日本的军国主义利用了武士道，因为武士道中有一句名言“一旦拔刀你就完蛋”，也就是说武士道其实并不是杀人第一。

李长声：武士道是对武士的一种规范，是一种修养，让你好好当领导阶层，领导下面的“农、工、商”。

问：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个关于广州地铁和日本地铁的问题。刚好我两边都坐过，一个特点是，日本的地铁站好像都会有洗手间，然而广州目前运行的很多地铁站都是没有洗手间的。

李长声：各有各国的情况。日本的车站、茶馆、

饭店都有厕所,但是你在马路上很难找到厕所,所以有时候你为了上厕所不得不进站。

日本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危机感



问:我的疑问就是,有时候我到日本那边,出差或者短期旅行,发现那边的电视台播放的新闻描述到日本人的生活有很多非常痛苦的地方,但是国内的年轻人对日本的印象非常好。然后我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在日本那边的体会,日本是怎么看待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呢?

姜建强:整体上说分两大块。以前日本人在经济上看不起中国人。早年间我们去日本,这方面感受很深。中国人当时都到日本打工挣钱,当时的中国经济却确实不如日本。

经过最近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人变得有钱

了。现在年轻的一代去日本与我们那个时候相比有个显著的区别是，他们不常打工，但消费还挺高。在东京的各个料理店，一大消费群体就是刚刚过去的90后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日本人觉得我不能在经济上歧视你了，因为你有钱了。但是呢，在文化上、在政治层面上，日本对中国人还是有偏见。在这些方面还未消除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偏见。

万景路：我补充一句，（日本人对中国人）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危机感。就我个人对日本人的感觉啊，跟人聊天什么的，他们真的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危机感在里面。

问：我想问一下几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加入日本籍？中国人去到日本，他保留中国国籍，与加入日本籍，这两者在生活或者社会福利上、做生意、工作上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有朋友去日本留学，我觉得他在日本发展会比在国内好很多，包括待遇、机会。我也曾经怂恿他入日本籍，而且对他来说入籍并不难，但是他仍然在犹豫。想听各位老师的看法。

姜建强：我感觉还是有个强大的中国在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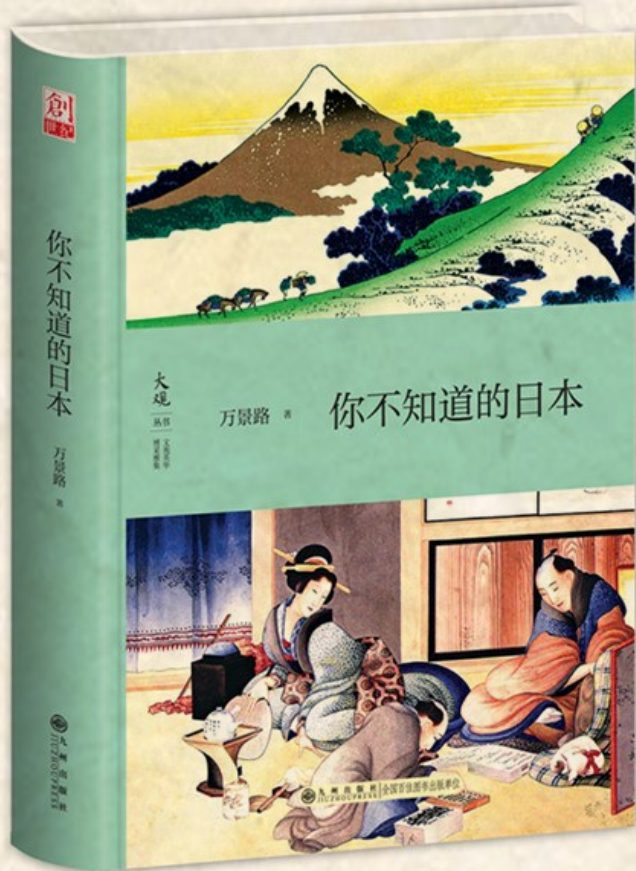
亦 夫：我们都可以入籍，但是都没有入日本籍，不入籍唯一的不方便就是目前中国护照没有日本护照那么方便，我们作为普通人不想那些宏大的问题，我们会考虑便捷的因素，用中国籍回国会比较方便，而且也不是需要跑很多国家，中国护照也会越来

越好用。

推荐阅读:《你不知道的日本》

万景路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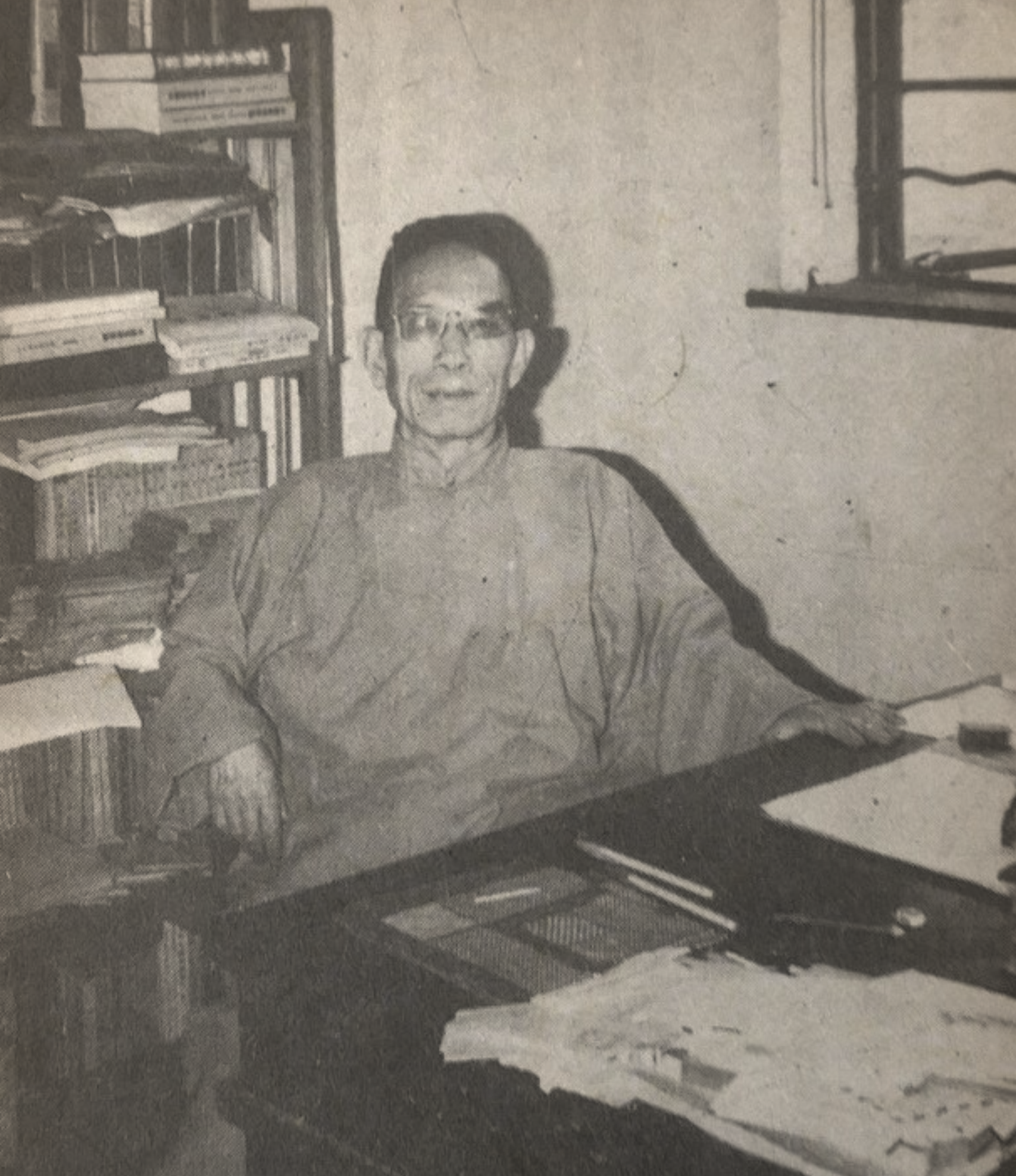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作者以自己在日本近三十年或目睹或直接感受到的日本人的生活细节、行为方式和内心思想等为基,通过百篇文字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了普通日本人的细腻的生活特色,另类的历史宗教和有趣的风俗轶事、饮食文化等,以期透过这些文字能够让读者看到一个直观、真实的日本,并进而能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道德观以及行为准则,从而加深对日本人以及这个国家的认识。

“讀·享·團”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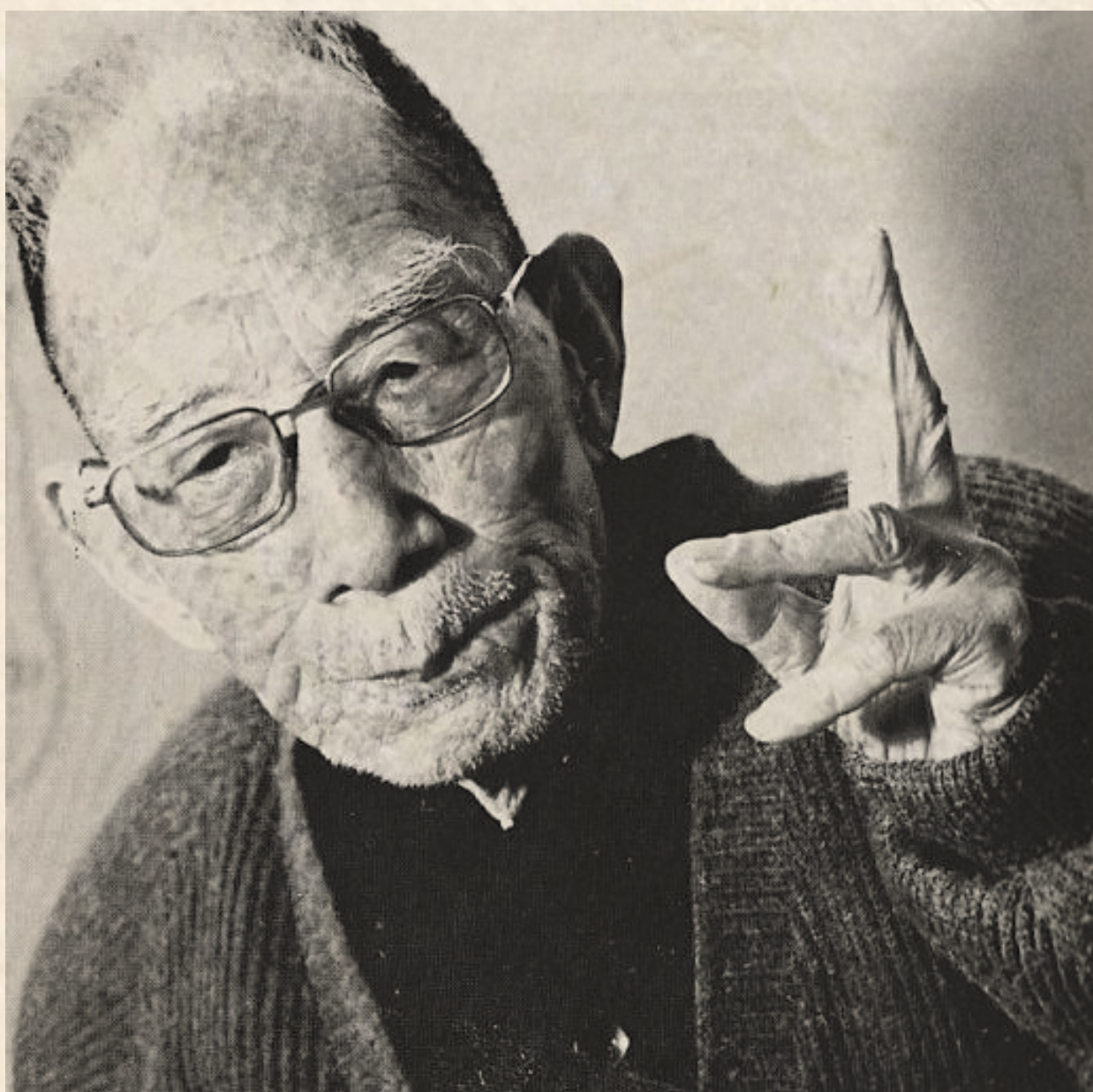
关于“生命”的学问 ——论五十年来的中国思想

◎ 牟宗三/文

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

此

五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失其本。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



（牟宗三晚年）

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然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

我们自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上大体皆知道要求科

学与民主政治。但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自其出现上说，是并不能自足无待的。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我们近五十年来的学术方向是向西方看齐，但是我们只知道注意西方的科学。科学中是并无生命的途径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

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要不，就是二毛子的意识，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文学艺术是创造之事，不是学问之事。我们天天在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若没有他们那种生命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的学术方向是以科学为普遍的尺度，我们不注意他们的生命学问，读哲学的是以理智游戏为满足。西方的哲学本是由知识为中心而发的，不是“生命中心”的。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哲学界是以学西方哲学为主的。所以只注意了他们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辨，接触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读西方哲学是很难接触生命的学问的。



西方哲学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领域内，而是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一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表面看起来，多姿多彩，实则皆未入生命问题之中心。诚如王充所云：“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论衡·本性》篇语）揆之西方正宗哲学，此皆不免浪漫外道之讥。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他们有神学，而他们的神学的构成，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部分是《新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就

是这一点，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方向所不接近的。对于西方如此，对于中国的生命学问，则更忽视而轻视了。



实则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他们对于这个学问传统，在情感上，倒不是偏爱，而是偏憎了。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倒是有偏

爱,可是以其科学的理智主义,对于西方的宗教,就是想爱,亦爱不上。

这就表示中国近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样的浅陋了,对于生命学问是怎样的无知了。对于生命学问的忽视,造成生命领域的荒凉与暗淡,甚至达到漆黑一团之境了。所以知识分子的智慧、德性与器识,真是无从说起了。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诚于今日验之矣。《易·系》曰:“极深研几。”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研几是生命学问透彻以后的事。我们不能“通天下之志”,所以也不能“成天下之务”。

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清入主中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晚明诸大儒,顾、黄、王之心志,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他们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之政体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家法与制度,不能不有一彻底之反省与改变。他们的心志,大体上说,是与西方的十七八世纪的方向并无二致。他们所处的时代亦正当西方十七八世纪之时。然而在西方,却正是一帆风顺,向近代化而趋,而他们的心志,却遭遇清之歪曲,而继续不下来,因而并未形成与西方相平行之发展。



(顾炎武)

平常说中国落后了三百年，其实不是落后，乃是歪曲了三百年。这歪曲的三百年，说短固不算短，然而把历史拉长了观，健康其心志，不怨不尤，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从速觉悟，扭转此歪曲的陷落。可惜入民国以来，这歪曲的遗毒，仍然在蔓延，而不知悔，且借口于科学以加深其蔓延。人们只知研究外在的对象为学问，并不认生命处亦有学问。人只知以科学言词、科学程序所得的外延真理(Extensional truth)为真理，而不知生命处的内容真理(Intensional truth)为真理。

所以生命处无学问、无真理，只是盲爽发狂之冲动而已。心思愈只注意外在的对象，零零碎碎的外在材料，自家生命就愈四分五裂，盲爽发狂，而陷于漆黑一团之境。在这样的生命状态下，我们凭什么要求科学？我们凭什么要求民主建国？然而追求科学真理，要求民主建国，却是民族尽性之大业。而“尽性”是生命上的事，是靠一种生命学问来恢弘其内容的。我们的思想界并未在这里建立其纲维，以端正学术之方向，清醒并凝聚我们的民族生命的。中国从古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试问今日之大学教育，有哪一门是“明明德”。今之学校教育是以知识为中心的，却并无“明明德”之学问。“明明德”的学问，才是真正“生命”的学问。



生命的学问，可以从两方面讲：一是个人主观方面的，一是客观的集团方面的。前者是个人修养之事，个人精神生活升进之事，如一切宗教之所讲；后者

是一切人文世界的事，如国家、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事，此也是生命上的事，生命之客观表现方面的事。如照儒家“明明德”的学问讲，这两方面是沟通而为一的。

个人主观方面的修养，即个人之成德，而个人之成德是离不开国家天下的。依儒家的教义，没有孤离的成德，因为仁义的德性是不能单独封在个人身上的，仁体是一定要向外感通的。“义以方外”，义一定要客观化于分殊之事上而曲成之的。故罗近溪讲《大学》云：“大人者连属家国天下而为一身者也。”何以是如此？就因为仁义的德性一定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的。且进一步，不但要客观化于人文世界，且要扩及于整个的天地万物。故王阳明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程明道云：“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根据《中庸》“成己成物”而来。“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合内外之道也。”也是根据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而来。儒家的教义就是要这样充实饱满，才能算是成德。不是个人的得救，一得救一切得救，一切得救始一得救。个人的尽性，民族的尽性，与参天地赞化育，是连属在一起的。这是儒圣的仁教所必然涵到的。

有这样的生命学问，始能立起并贞定吾人之生命，而且真能开出生命的途径，个人的与民族的，甚至全人类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学问。道德价值意识的低沉，历史文化意识的低沉，无过于此时。是表示中华民族之未能尽其性也。只有

业师熊十力先生一生的学问是继承儒圣的仁教而前进的，并继承晚明诸大儒的心志而前进的。



(1946年9月熊十力返汉口经上海时在学生朱慧清家与学生牟宗三等合影留念。由右至左为：丁实存、熊世菩、徐复观、朱霈(男童)、熊十力、高纫秋(后立)、朱宣琪(女孩)、张立民、朱雷民、牟宗三)

就我个人说，自抗战以来，亲炙师门，目击而道存，所感发者多矣。深感吾人之生命已到断潢绝港之时。乃发愤从事文化生命之疏通，以开民族生命之途径，扭转清以来之歪曲，畅通晚明诸儒之心志，以开生命之学问。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三书之所由作也。

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大体可分三个阶段。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诸先生为第一阶段；五四运动为第二阶段；十七年北伐以后为第三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思想之混乱与浮浅，以及其离本走邪，历历在目。故吾

自学校读书起至抗战胜利止，这十余年间，先从西方哲学方面厘清吾人所吸取于西方思想者之混杂，而坚定其“理想主义”之立场。此阶段之所思以《逻辑典范》（后改写为《理则学》）与《认识心之批判》两书为代表。此后至今，则归宗于儒家，重开生命之学问。上承孔孟，下接晚明，举直错诸枉，清以来之歪曲，可得而畅通。中华民族终当尽其性，克服磨难，以屹立于天壤间。

（1961年1月《中国一周》）

本文选摘自《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

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立异求同的历史写作

◎ 聂圣哲/文

中国人自古就有爱面子、讲情面的陋规习惯，张耀杰在学术研究领域一反常态，他不留情面地较真纠错、立异求同，甚至达到“一根筋”的程度……



(1914年11月8日，孙中山与陈其美等在东京芝樱田町丸木照相馆合影。左起：谭根、戴季陶、孙中山、夏重民、陈其美)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张耀杰的本职专业是戏剧学研究。由于他1980年代担任农村中学英语教师期间，深受一些英文原典的影响，进入研究岗位之后，他很快便由戏剧史研究转向更加宽广的民国史研究，并且有意识地继承发扬了胡适先生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谱系。在2014年出版的《民国红粉》和《北大教授与〈新青年〉》两本书中，张耀杰曾经反复强调这种以个人为本体本位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谱系当中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价值要素。

基于这样的价值要素和价值谱系，张耀杰认为，中国社会家国一体、等级森严的宗法农耕及皇权专制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教合一的儒教文化，与工商契约的近现代文明之间的显著区别，其一是缺乏系统性、多元

化的谱系思维，习惯于抓住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的单一要素上纲上线、极端发挥，从而单边片面地区分出互不兼容、党同伐异的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忠臣清官与奸臣贪官、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敌对双方；而不是像提倡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胡适那样，既注重于创新立异的个人价值最大化，又把所有的创新立异归结于人类大同的共同进步。其二是缺乏责任担当的罪错意识，不是像现代工商契约社会的文明个人那样，在私人权利与公共责任边界明确的前提之上，习惯性地反省和承担属于自己的一份罪错责任，进而虚心诚恳、正大光明地纠错改过、自我健全。



具体到张耀杰个人来讲，他的充分世界化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一直以只问耕耘、不求回报的公益心态从事学术研究，并且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方面不留情面地较真纠错、立异求同。

中国人自古就有爱面子、讲情面的陋规习惯，张耀杰在学术研究领域一反常态，他不留情面地较真纠错、立异求同，甚至达到“一根筋”的程度。我自己和张耀杰在不同场合对于某些事情的观点，也是迥然不同，甚至有过当面争吵的经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私人情谊和持续交往。另一位民国史研究者叶曙明先生，与张耀杰也有“过结”，他的《中国1927·谁主沉浮》，曾被张耀杰在书评中热心推荐；另一本《国会现场》，却被张耀杰的另一篇书评尖锐指责。所幸的是，叶曙明并没有计较此事，继续与张耀杰保持良性互动……

说句真心话，我有时候也很烦张耀杰，但又忍不住要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在我看来，张耀杰的可敬可爱处在此，可恨可憎处也在于此。

按照张耀杰的说法，早在1913年1月24日，由谢石钦主持的湖北革命实录馆，就已经在《呈副总统职馆开办以来情形并编纂办法及请催湖北军政府建设始末由》的呈请公文中明确认定，该馆收录的辛亥革命首义将领及功勋人士的文献资料，“大都私人攘臂言功之作，求其以事系人，而以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发达为前提者，几如凤毛麟角之不易得”。现在所能看到的几乎所有辛亥革命亲历者自述自传的回忆文字，基本上都可以用“私人攘臂言功之作”来加以概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历史老人都在抬高自己、诋毁别人方面，都留下了说谎造谣的人生污点。



基于较真纠错、立异求同的学术追求，张耀杰的历史著述的主要特征，就是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史料发掘和文献考据。这种历史著述适宜于远离喧嚣的慢阅读，而不适宜于文化泡沫时代的快消费。张耀杰从来不奢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人见人爱的畅销书作家；而是脚踏实地致力于既有历史价值又比较好玩有趣的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稍微有些耐心的读者，是不难从他既严谨理性又爱憎分明的相关著述中，得到眼前一亮、茅塞顿开的新发现、新感悟的。拨开谜团之后的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会使您在了解历史真相的同时，不断修正自己的思维方法、不断充实自己的价值谱系，从而体验到一种从百思不得其解的学术困惑中瞬间顿悟、豁然开朗的阅读快感。

在这部《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中，张

耀杰围绕着陈其美黑白两道的会党传奇，发掘澄清了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秋瑾、胡道南、汪公权、陈兴芝、陶骏保、陶成章、周实、阮式、张献贞、宋教仁、夏瑞芳、范鸿仙、郑汝成、陈其美、王金发、姚勇忱、韩恢、王治馨、张宗昌等一系列人命大案的历史真相，从而为广大读者扎实认真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依据。至少在这一点上，张耀杰对于民国初年的历史研究，是别具一格、不可替代的。这也是我愿意为他的新书写作序言的主要动因。至于我的这种认知是否正确，每一位细心的读者细读本书之后，自然会有所判断。对于您来说，这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却关系着张耀杰和我本人做人做学问的公德诚信！



(陈其美)

关于这本新书,我以为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本书是2012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的姊妹篇。书中的主要人物及事件,在张耀杰专门研究宋教仁命案时,已经有所涉及;只是没有能够以个人传记和个案叙述的方式深入发掘和充分展开;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已经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间。第二,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尽量不再引用原文和加写注解,同时又尽可能地说明文献出处,以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完整。据张耀杰介绍,他还将陆续发表相关的学术文章,专门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界师友进行互动商榷,以便达成“真理越辩越明”的理想状态。

在一次叙谈中,张耀杰谈到他一整套的写作出版计划,其中包括写作反思胡适不够健全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罪错胡适》;揭露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伪造改写历史文献的《罪错康梁》;继《民国红粉》之后续写《红粉二集》;修订整理十多年前写作完成的一部人类宗教学著作。这是他作为历史研究者有意识地为下一代预留的历史素材和历史记录,其中以舍弃牺牲个人的种种物质欲望和精神奢求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抑制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私人攘臂言功”的劣根陋习。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刚满50岁便满头白发的张耀杰,竟然因过度劳累而患上了糖尿病。作为他的读者和朋友,我衷心希望他在今后的岁月里能够爱惜身体,从而平平安安地实现他较真纠错、立异求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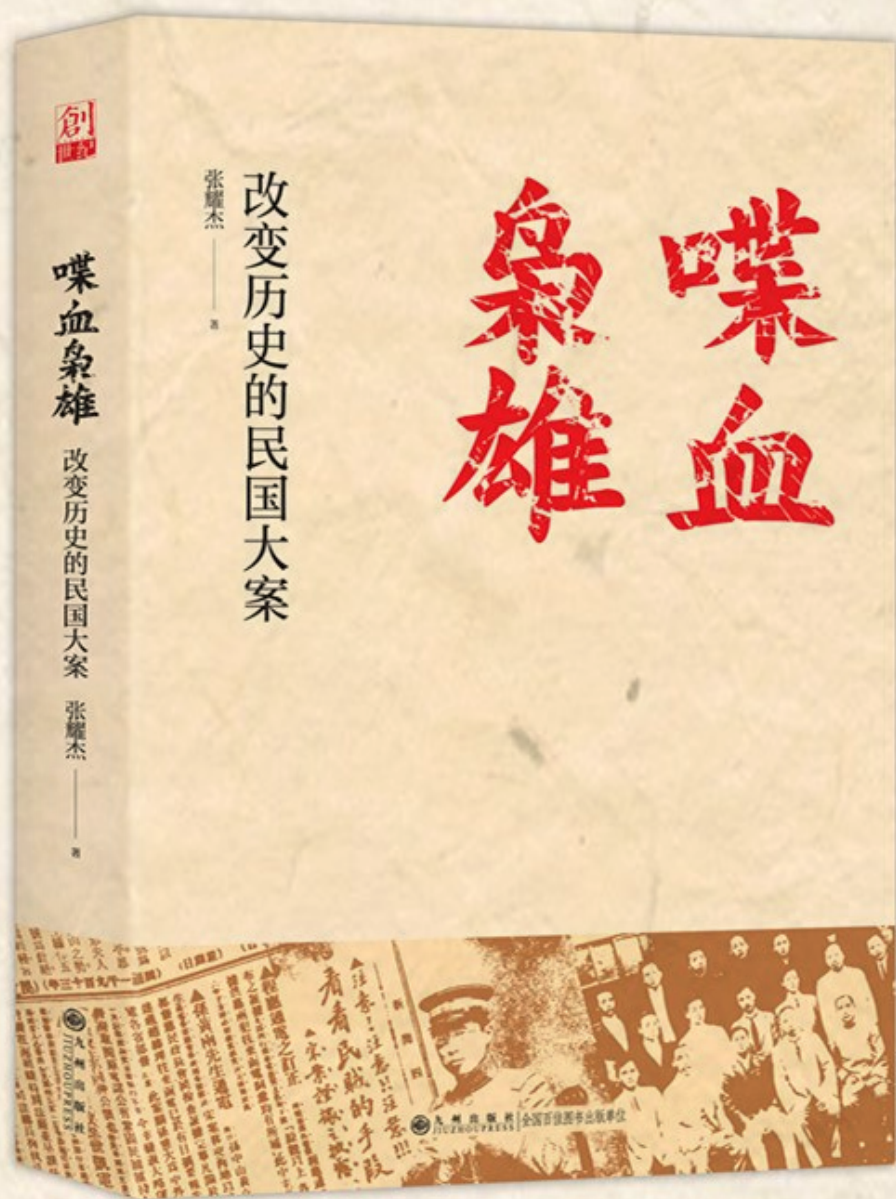
学术愿景，以及由此而来的淑世情怀；同时也祝愿他的这本新书，能够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更多的慧眼知音。

2015年5月16日于姑苏城外改华堂

本文摘自：《喋血枭雄：改变历史的民国大案》

张耀杰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的姊妹篇。书中以同盟会元老、上海帮会枭雄陈其美的传奇人生为主线，发掘澄清了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秋瑾、胡道南、陶骏保、陶成章、周实、阮式、宋教仁、夏瑞芳、范鸿仙、陈其美、王金发、韩恢等一系列政坛大案历史真相。

本书是作者长年从事文献考证和人物追踪的成果结晶，故事情节通俗完整、雅俗共赏，为广大读者扎实认真地反思历史、展望未来，提供了较为可靠的文本依据。



孤独者上路

◎ 李文凯/文

哲学学派的优点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承认权利的原则，并将之作为判断事实的不可更改的法则。其错误在于它对事实的认识是微不足道的……

海

炎邀我为他的文集写序，我顿感压力。作为天生就是要说话发言的评论部评论员，既然无法将满腹热情与锦绣付诸公共表达，那可以想象，他会有多少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我离开文字工作已经多年，对于如此积累而成的作品，还能有什么指点评价呢？



那就先来说说我所认识的邝海炎吧。初相识时，我们都唤他作“矿工”，具体缘由并不可考，海炎也并没有一副白牙黑脸兼筋骨体格。但反正码字为生者，也无异于在矿井里摸黑卖力。倒是后来，大家风流云散，邝海炎却依然还能守住一方书桌，常有数昼夜狂读的纪录。尽管已经不再在报章上看他署名“狂飞”的专栏，但朋友圈里总是会被他寥寥数语的犀利文字所吸引。渐渐地，“矿工”的称谓变成了“邝公”——他的博闻与笔力不仅让他自得，也为我们这些朋友所

喜。

海炎是历史系科班出身，他对于历史有着天然的喜爱。关于这段情结，在他《需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历史专业吗？》一文中有很有趣的自陈。同时他又对公共言说抱有热望。这让我想起基佐的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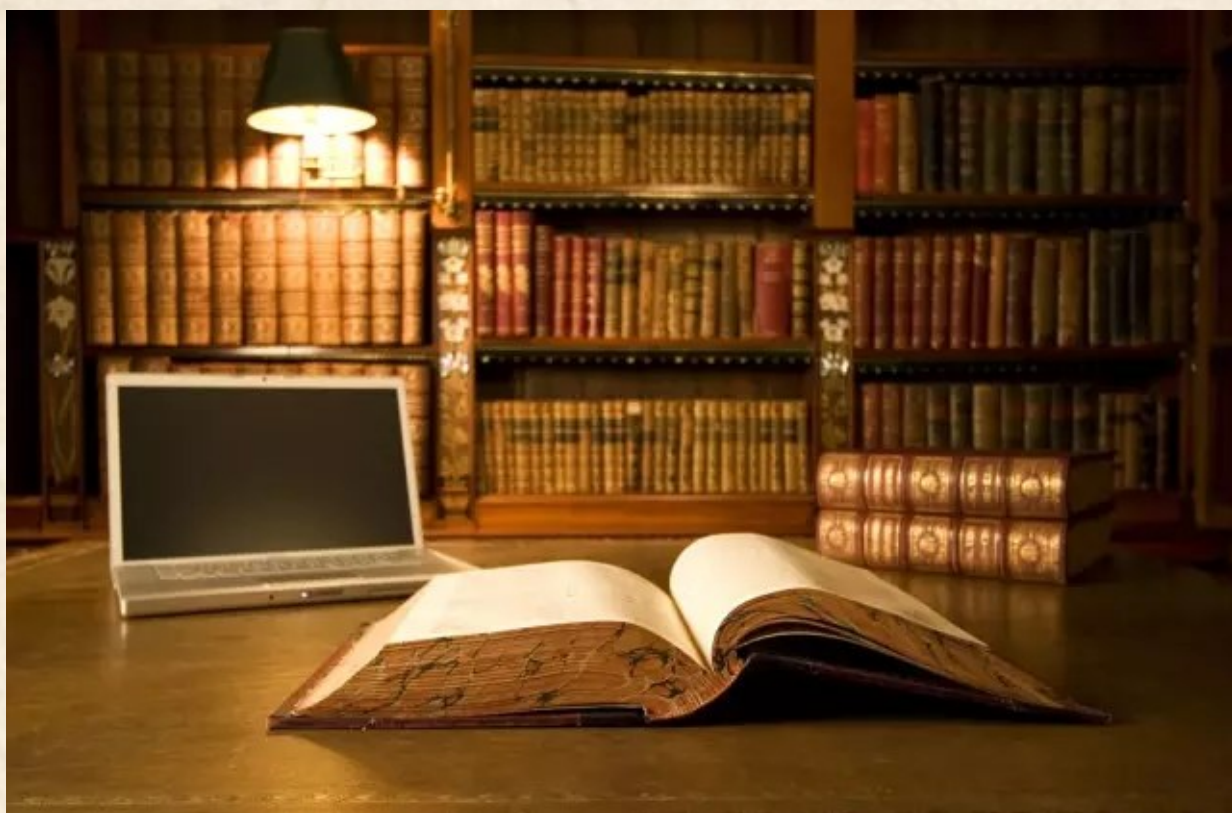
“哲学学派的优点是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承认权利的原则，并将之作为判断事实的不可更改的法则。其错误在于它对事实的认识是微不足道的、不完全的和轻率的；在于它不承认事实所拥有的不可分割的力量以及它们永远具有的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历史学派对事实的了解更多一些，也能够更加平等地来认识它们的起因和结果，对其元素的分析更可靠，对某种权利的认识更准确，以及对可行性改革的估价更公正。但总的来说它缺乏固定的原则，它的判断变动不已；因此它几乎总是不愿下结论，从未能满足人的愿望。相反，哲学学派冒着误入歧途的危险，在这方面总是引人注目。”



这个论断，对于我自己是相当有解剖力的。但以我所接触过的师友而论，却又相当不确。事实上，我以为对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最有解释力、最有评价原则、最敢于下结论的，往往就是有着深厚历史功底的学者，如秦晖、朱学勤。抑或这是因为他们作为历史学家而又愿意面对中国的现状问题并面向公众发言？海炎的路子，大抵也是如此。因而读者可以在这本集子里读到论证绵密的《“鲁迅风”的传统渊源》、《“掉书袋”与周作人文章的“涩味”》，也能感受到手起刀落大快朵颐的《自由与闲暇》、《“丑星”的现代兴起》。

海炎与我同事之前，是在天涯网站。在那个BBS最能抒怀议事的年代，天涯的经历也是他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使得他下笔行文，常能带有草根的视野与互联网精神。前者，使得他相信启蒙但也质疑启蒙的姿态；后者，更令他深谙互联互通的传播价值。这些要素，在他的这本集子里比比皆是，这是他后浪推前浪，比之其前辈而能行之更远的一条线索。

记得他曾经论说，电子书必定将会在简单的阅读功能之外，衍生出诸多模拟纸质书特质的功能来，例如墨香，例如摩擦感。这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2015年我离开报社东去杭州，将满书柜的藏书悉数赠人。如今的这部书稿，也是我用手机断断续续看完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难得的重温。时间过去得并不久远，那时候我们还可以欢呼“不再孤独的喧嚣”；现今四周依然“喧嚣”，却不再“不再孤独”。



按说好的文字总是稀缺的，但似乎好的文字不再被那么需要。这也许是因为注意力经济使然，也许是因为娱乐化文本使然。但我们还不得不承认一点，文字，作为内容的载体，不再唯一，不再垄断，甚至不再有优势。自古文以载道成为传统，但作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文与道之间发生过多次的分离，对于国人来说，书法成为艺术是一次。书法不再与载道之文构成灵肉之合，而是在现代书写技术的发展之下，渐渐变成少数人掌握的技能与小众能够欣赏的对象。

如今，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字更被淹没。因为表达内容、表达一种态度和意向，影像明显更具有张力。连微信沟通都懒得打字了，直接语音过去了事，这是便捷性选择；以“罗辑思维”为代表的说书节目乃至说书软件大行其道，这是生活场景的变化；视频随处可见、电影市场火爆、美剧甚至可以成为“21世纪的长篇小说”（陈丹青语），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下表达

形式的行业变迁。



是不是可以大胆地推测：就像书法从知识人的基本功演变为少数人掌握的艺术技能，“好的文章文字”也将如此。那些精巧的遣词造句、修辞比赋、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大众一定还能见到，但未必都能通晓了。

在一片喧嚣中，还愿呕沥心血化为墨痕的，注定要成为孤独者。我们并不需要急于去证明时代与自己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源于个体审美观对人生的设定。春花秋月、佳人胜景，是一重审美；求知论道，逻辑严密，也是一重审美；自我坚持，正大光明，还是一重审美。

就像海炎在集子最后留给读者的一个小惊喜，对100部书做了阅读推荐。那些精短可观的文字，令我一见如故、摩挲难舍。他的努力，证明了孤独者终究

要独自上路；我的品叹，说明了孤独者一定会相逢。

本文摘自：《快刀文章可下酒》

邝海炎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作者博览群书，视域广阔，秉承宋儒“格物”的精神，对于上天入地各种事物，无不喜欢拿来一“格”。本书论述举凡文学、思想、历史、电影、美食、运动、游戏、性别等等，看似汗漫无归、洋洋大观，实则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学感发，“问题意识”更是一以贯之，此即“个体自由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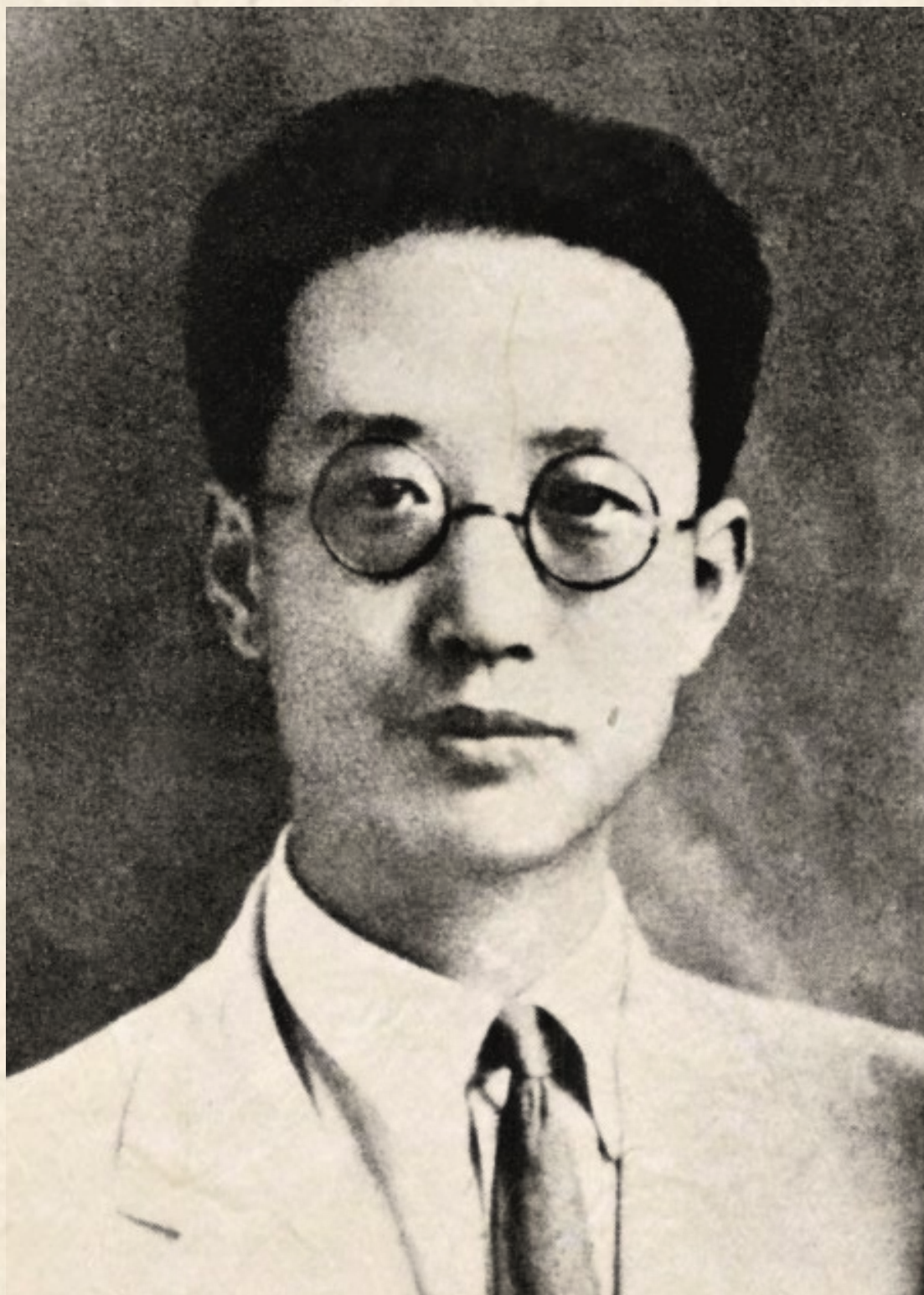


瞿秋白：真实的灵魂（一）

◎ 曾纪鑫/文

人生有大休息，也有小休息，秋白所说的“休息，休息，休息”，自然是指离开人世的“大休息”……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在国民党百万大军第五次军事围剿下，不得不离开江西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瞿秋白随一部分牵制敌军从事游击战争的力量留于赣闽边区后，在不成比例的敌我悬殊力量下，肯定多次感到了死亡的残酷与威胁。他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生命会在福建长汀画上最后的句号。



(瞿秋白)

死对瞿秋白而言，并不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十七岁那年，母亲因家境困窘之极与流言蜚语的中伤，吞服烧酒拌和的两盒火柴头，在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痛苦折磨中凄然离世，种不正常死亡的阴影从此便深深地烙印在瞿秋白那忧郁而敏感的心头。自从投身革命置身于时代的风口浪尖，秋白也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而在他担任党的重要领导人期间所经历的一系列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加之久治不愈的严重肺病，更使他感到“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心中长期盘踞的念头，就是“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

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1930年初或是1934年八九月间的情形，一连用了三个“休息”，并在后面打上两个惊叹号。人生有大休息，也有小休息，秋白所说的“休息，休息，休息”，自然是指离开人世的“大休息”——一种令人渴望的“甜蜜”休息，对人生痛苦的解脱与灵魂的永恒安息。

尽管如此，当死亡真正降临时，瞿秋白还是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对人生的依恋与执着。

红军主力决定转移，秋白收拾好行李，准备和大家一起长征。据吴黎平在《忆秋白同志相处的日子及其他》一文中所叙，当瞿秋白突然得知自己将继续留守苏区时，神色黯然，“心情有些激动，但没有吭气”。会后吴黎平邀请瞿秋白到他家吃饭，“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别多，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

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

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后,国民党必将以十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把一个重病在身的党的高级领导人留下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然而,党性原则极强的瞿秋白除了服从外,终究是什么也没说。但透过神色黯然、一声不吭、大量喝酒等神态举止,我们还是多多少少窥见到他那复杂的真实心态。秋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心胸狭窄的当权派王明等人,是不会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带在身边的。当然,他们防备了瞿秋白,却疏忽了当时也是重病缠身的毛泽东,一场“遵义会议”,就将一部中国革命现代史给全部改写了。

1935年初,国民党以十万多正规军的绝对优势兵力,还有空军的协助,向坚守苏区的少量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红军伤亡颇大,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头突围。而此时,瞿秋白的肺病也愈加严重了。中共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瞿秋白从瑞金突围转移,取道香港赴上海就医,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邓子恢及身怀有孕的项英妻子张亮。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成立新民学会，图为该会部分成员1919年1月16日在长沙合影（三排右一为何叔衡，五排左四为毛泽东）]

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江西瑞金，18日抵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汤屋，并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瞿秋白直到临死前都没有想到，正是汤屋的逗留给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与祸根。

为保证瞿秋白等人的生命安全，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又抽调了二百多名战士沿途护送。在汤屋，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也加入到这支队伍之中。他们昼伏夜行，安全地通过了敌人一层又一层严密封锁，于2月24日拂晓渡过汀江，来到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桩岭附近时，阴沉的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一连四天，他们攀山越岭，秘密行动，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早已疲惫不堪。加之一路行来，并未遇到什么危险，也就放松了警惕，决定吃个饱饭，避避雨，休息调整一下，下午继续上路。

没想到一时麻痹，酿成无法挽回的惨重后果。他们正在山上一户人家吃饭时，被地方武装保安团发现，立时遭到围攻。邓子恢突出重围，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身体虚弱、行动艰难不幸被俘。

瞿秋白与同时被捕的张亮、周月林按事先的化装及准备好的口供应对审讯。秋白说自己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江苏人，肄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曾在上海经营旧书店与古董生意，后又学过医术，在游历漳州时被红军俘虏，送到瑞金后在红军总卫生部任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等职。而张亮则是一名被红军“绑票勒索”的香菇客商老婆，周月林为红军护士，她们俩自然都用了化名。



(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开幕后留影，后排左三为周月林)

瞿秋白被俘不久，便被押解到上杭监狱。因从瞿秋白身上搜出黄金、港币等贵重物品，且随行人员大多携有驳壳枪，保安团怀疑所谓的林琪祥极有可能是一员共产党“要人”。然而，不论敌人如何严厉审讯、酷刑逼供，瞿秋白始终坚持最初口供，一口咬定自己就是林琪祥。因为事先有过可能被捕的心理准备，所以瞿秋白的年龄、外表、气质不仅与扮演的林琪祥这一角色十分吻合，其心态也相当从容，敌人几乎找不到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准备放人了，只要瞿秋白写信给上海的朋友证明身份，或是在当地寻觅铺保，以证明自己与共产党确实没有关系，就可以开释。

鲁迅、周建人、杨之华收到瞿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来的信，得知秋白落入敌手，立时采取营救措施，找铺保，汇钱寄物。



（鲁迅和瞿秋白）

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遭敌袭击牺牲，其妻徐氏被俘，经不住敌人严刑拷打，供出了在濯田地区抓获的俘虏中，就有共产党的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因为瞿秋白一行在汤屋停留时，曾受到万永诚夫妇的热情接待，徐氏自然知道瞿秋白的行踪。

后来，为追查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无辜的张亮与周月林可谓背尽了“黑锅”，因为随行人员中，只有她们俩知道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一时找不到真正的叛徒，“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也就顺理成章并为多数人所认可。并且很快就有了一则关于张亮的传闻，说她出狱后辗转来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找到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

项英一见叛徒妻子，怒不可遏，不待张亮辩解，当即拔出手枪，将风尘仆仆的张亮一枪击倒在地。直到今天，这一传闻仍以讹传讹地在报刊、网络广为流布。



（右为项英之妻张亮）

其实，项英当时颇有耐心地听完了张亮的叙述，一同听完了的还有曾山。张亮并非死于丈夫枪口，而是将儿子送往延安后，于返回皖南的乱世途中失踪。而活着的周月林更是惨遭折磨，1955年后一直关在监狱里劳动改造。直到1979年在一份国民党当年的报纸上发现“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的

报道,且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等资料相互印证,才给周月林平反昭雪,无罪释放,并为她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办理离休手续。



(周月林在新昌住宅后山留影)

当年指认瞿秋白的郑大鹏是一名被俘的苏区收发员,他虽然没有担任红军要职,但因工作关系认识瞿秋白。投降变节的郑大鹏于暗处证实,所谓的林琪祥确系共产党前任领袖瞿秋白。

于是,情势急转直下,瞿秋白作为要犯于1935年4月25日左右解送到设于长汀一中的国民党36师师部。以防意外,上杭方面派出一个连押送,36师派出部队中途接应。

瞿秋白刚被敌军抓获时,采取的态度是积极求生,期望等待。而身份一经暴露,秋白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对审讯的敌人坦然一笑道:既经指

认,也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述口供,就算是作了一篇小说一样。”

瞿秋白心里比谁都更加清楚,身份确认后无非面临两种结局,非死即降,二者必居其一。降非所愿,那么只有待死一途了。当希望破灭,早已作好赴死准备且曾经多次徘徊在死亡边缘的瞿秋白,也就彻底打消了一切生还努力。从所有留存下来的资料来看,就连破壁越狱这一羁押者最容易闪现的念头,秋白心中也从未有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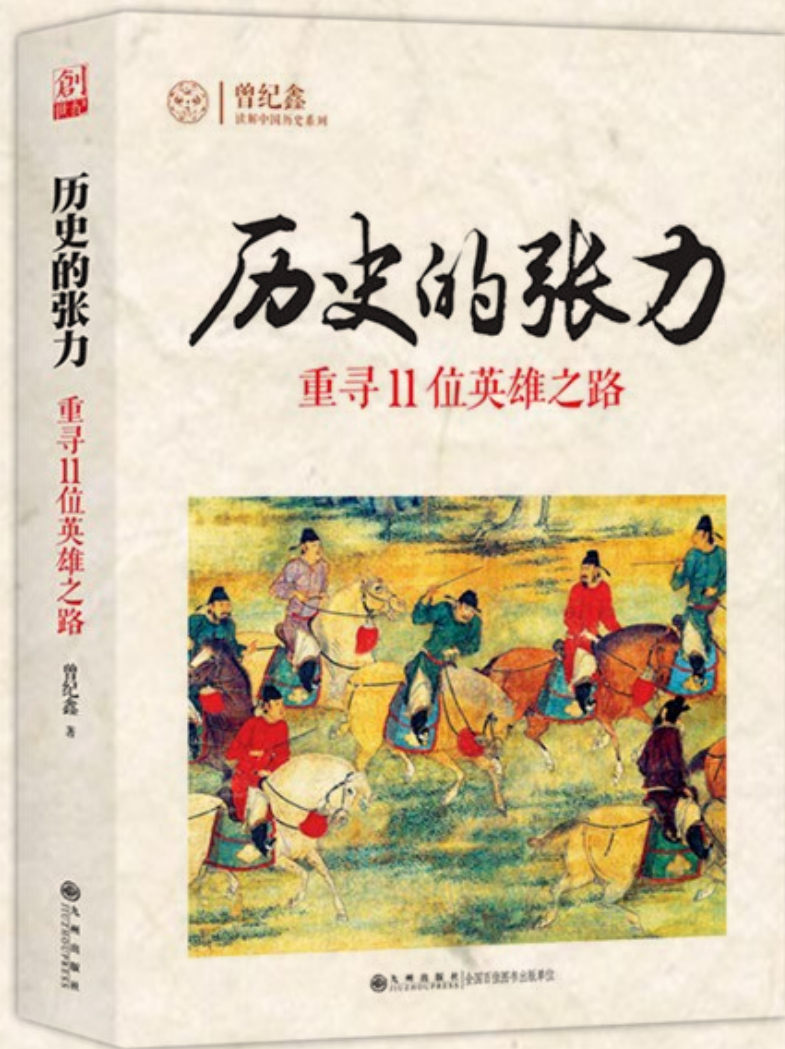
而上海的鲁迅、周建人及瞿秋白妻子杨之华,仍在想法营救。特别是对瞿秋白怀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之深厚情谊的鲁迅,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他打算与陈望道一同发起公开营救活动,未获成功;又通过蔡元培的声望及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内部打开

“缺口”，认为瞿秋白是一位有才气的文学家，留下来对中国有好处，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反对，特别是国民党右派代表戴季陶坚决要求“处决”瞿秋白。

本文选摘自：《历史的张力：重寻11位英雄之路》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叙写、读解的十一位历史人物，有被后世誉为“智绝”的诸葛亮，创作世界第一部茶书的陆羽，“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的朱熹，七下西洋的郑和，编

撰《本草纲目》的李时珍，“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面临时代巨变作出“另类抉择”的萨镇冰，不惜生命高风亮节的瞿秋白，还有“半截子英雄”李自成以及作者笔下少有的女性人物——肩负和亲使命的王昭君、文成公主。他们都是当时的英杰，其成就往往就是一座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山峰。

作者除大量阅读、考证外，还前往这些历史人物的故居、墓葬、纪念馆以及相关遗址，考究故迹，还原事实，揭示真相，感悟历史，以点带面，探寻价值，阐释意义……这种“历史的在场性”写作，使得作者笔下的人物，极富弹性与张力。



金门的炮弹

◎亢霖/文

1958年8月23日是个历史节点，这一天，两岸发生激烈军事冲突，无论被称为“八二三炮战”，还是“金门炮战”，都在瞬间里震撼了世界……



(解放军炮兵部队猛烈轰击国民党金门驻军)

1958年8月23日是个历史节点,这一天,两岸发生激烈军事冲突,无论被称为“八二三炮战”,还是“金门炮战”,都在瞬间里震撼了世界,也在较长时间里,以曲折微妙的方式影响着大陆、台湾岛、美国三方,甚至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关系。

当天傍晚18点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金门,短短两小时内,四万五千多发炮弹落在仅有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的金门岛上,火力密集程度打破了“二战”后的记录。“八二三炮战”就此爆发,持续了四十四天,共有四十四万多发炮弹由金门岛承受。



(炮击金门机场)

金门作为国共内战的战场，不是第一次。1949年10月24日，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由叶飞将军率领，渡海强攻金门，由于后援不继，苦战三天，近一万名登陆部队牺牲被俘。这次战役的主战场在金门岛古宁头，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古宁头大捷”。尽管此战并没有真正决定两岸最终局势，在“国军”一路溃不成军的大格局下，却使国民党当局使劲拔高这次“胜利”的意义。至今，“古宁头大捷”仍被当作“保住台湾的关键战役”而纪念。



[金门地图(红色部分)]

此后，金门注定不会平静，这个地方离大陆太近了，跟厦门咫尺相隔，离台湾反而比较远。1954年9月3日，解放军对金门、马祖猛烈炮击，此后双方在这个区域又多次发生炮战、空战、海战，直至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

作为小小的弹丸之地，金门折射了远超一时一地的复杂博弈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反过去的态度，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被认为是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杜鲁门随即下令第七舰队侵驻台湾海峡，防止解放军攻打台湾，也阻遏蒋介石政权“反

攻大陆”。



(金门外围形势图)

1953年，共和党籍的艾森豪威尔击败民主党对手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放弃了杜鲁门的“围堵政策”，改采“反击政策”，声明“第七舰队不做共产中国的后盾”，也就是解除台湾的中立化，“放任”蒋介石自由为之，默许蒋军“反攻大陆”。中国称之为“放蒋出笼”，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但艾森豪威尔并不真鼓励蒋介石“反攻大陆”，最担心的是美国被拖入国共内战。艾森豪威尔的长期目标，是促使国民党当局不再“反攻大陆”，但共产党也不能解放台湾，将台湾与大陆隔离开来，“国军”从沿海诸岛撤退，达成“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局面，这目标跟他的前任杜鲁门大同小异。美国的算盘不仅被中国坚决反对，蒋介石也绝不接受。



(蒋介石巡视金门防御)

但蒋介石需要美国的“协防”，需要白纸黑字的保证，尤其在1954年初，美国主导的东南亚公约组织成形，参加者却并不欢迎台湾当局加入。台湾当局不得不加紧与美国订约，美国的条件是只有台湾当局承诺不发动针对大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才考虑缔约。

蒋介石的对策是行动，以战逼美。在这个阶段，国民党确实在各方面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1954年，国民党空军数次在大陆沿海攻击解放军军舰。中国方面则坚定表达解放台湾的目标。1954年8月1日，周恩来总理发表《解放台湾宣言》，接下来就是解放军9月3日的炮击金门。

美国不能坐视，12月2日，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终于签订，缔约前，双方发表声明，称条约是“防御性质”，不含攻击大陆的作用，条约规定，共同防御的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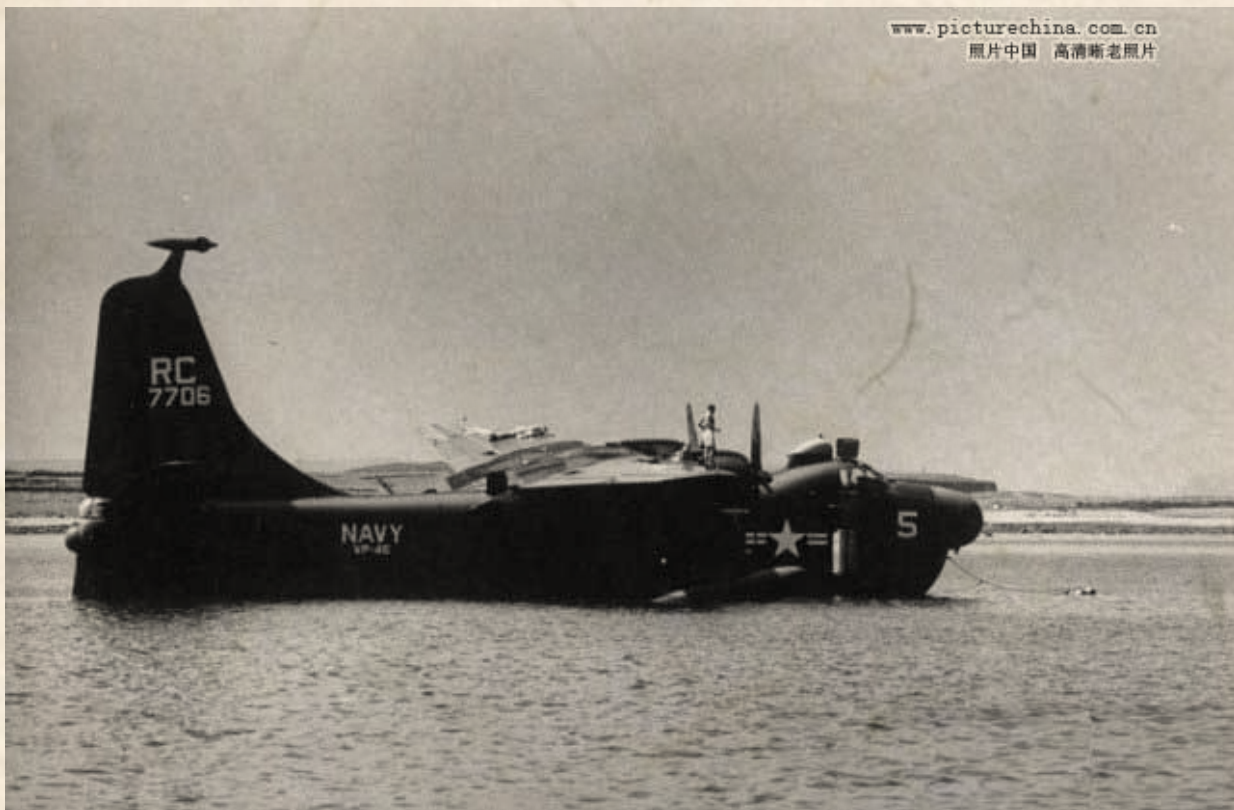
效范围包括台湾和澎湖，也就是不包括金门、马祖和其他外岛。

这个条约签字一个月后，解放军于1955年1月攻下大陆沿海的一江山岛，2月，国民党军队从大陈岛撤军。此时，国民党占有的大陆沿海离岛仅剩金门、马祖，美国继续压迫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蒋介石没有接受。国民党派驻重兵的金门、马祖，成为各方眼中的焦点。



（国民党士兵在金门）

在这种情势下，人民解放军为解除美蒋对新中国的威胁，推进解放台湾的目标，在1958年发动了“八二三炮战”。炮战中，美国方面增派军舰，增加物资援助，但仍小心翼翼避免与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毛泽东也下令只打蒋军，不打美军。当年9月，中国与美国在华沙恢复大使级谈判，同意情况不宜复杂化。



（美国海军在金门港）

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度向台湾当局表示，继续驻军金、马是不明智的，应当从这两个小岛撤军。这一次蒋介石不仅不接受，还发了抗议声明。蒋介石希望将美国拉下水，更深参与中国的内战。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眼中，金门不仅是保留反攻大陆希望的战略跳板，更是台湾与大陆保持联系的象征，他自视为“中国领导人”，怎能割断这种联系。

10月6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宣布停止炮击，为期七天，之后又延长两周，于10月20日恢复炮击。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表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并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此后，金门炮战形成彼此之间隔日对打的局面，而且不打阵地和居民区，多打在海边，到后来，双方都改打宣传弹。维持炮战局面但不再动真格的，将金门留在台湾当局手

中，这决策当然出自毛泽东。



(1 9 5 8 年 1 0 月 2 5 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发布
《告台湾同胞书》)

国共双方虽有默契，根本关系仍是敌对。对于“八二三炮战”，双方在宣传中都彰扬战绩，指摘对方。在8月23日解放军发动炮击这一天，“国军”金门防卫司令部三位副司令都殒命了，三人分别是吉星文、赵家骧、章杰，都曾是享誉一时的名将。其中吉星文正是指挥打响卢沟桥事变抗日第一枪的将领，这自然被台湾当局拿来大做文章。但吉星文的族叔吉鸿昌因为抗日反蒋，被蒋介石下令枪杀，被中共追认为革命烈士、民族英雄。

本文摘自：《一本书读懂台湾史》

亢霖著

九州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由资深驻台记者写出的历史随笔集，所有的随笔联合起来，是一部完整的台湾史。全书分为五部分，基本按年代划分，用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和事，体现出不同时代台湾的风貌、命运、价值取向。

一本书读懂台湾史，读懂一个海岛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历史也是情怀，是故事更有寄托。企望在比岛屿更广的地方，比眼前更久的时间里，有更多的灵魂被抚慰、安妥。



处暑篇·第33期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6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处暑

